

王智量 著

往事

与

怀念



013068330

I251
580

往事与怀念

王智量

著



北航

C1675995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I 251
580

01358833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往事与怀念 / 王智量 著.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 8

ISBN 978 - 7 - 5495 - 3855 - 3

I. ①往… II. ①王… III. ①回忆录—中国—当代
IV. ①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19037 号

出 品 人: 刘广汉

责任编辑: 魏 东

装帧设计: 赵 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 021 - 31260822 - 882/883

北京外文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北京市通州区马驹桥镇景盛南四街 15 号 邮政编码: 101102)

开本: 650mm × 960mm 1/16

印张: 2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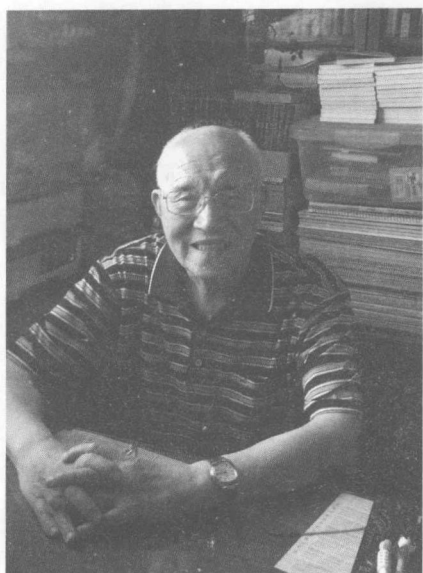
字数: 200 千字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单位联系调换。



前言

这是一些回忆过去生活的文字。这里所记录和描绘的，都是我个人生活中所遇到的人和事。

这些文字的写法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完全真名真姓的事实记录或怀念，比如《一本书，几个人，几十年间》、《永远的忏悔》、《迎春的花儿》等，以及那几篇追忆几位前辈师长的文字；另一类则是我用小说手法写下的一些故事和人物。

关于第一类，似乎没有必要给予特别的说明，反正全都是一切如实的记录。我是满含着对往事和逝者的敬重，诚心诚意写下它们的。但关于这第二类回忆文字的写法，好像有必要在这里做一点说明。

我觉得，往事的回忆可以有各种不同的讲述方法，比如类似写小说的方法，有情节，有人物，有描述，应该也是一种“形象思维”的产物。所以我想，写回忆也可以像写小说一样，写得绘声绘色，尽可能让人家愿意读，喜欢读，读后能有所触动，有所共鸣，能激发起读者的想象和情感。

于是我便产生了一个写“小说体回忆”的想法。这本书里有几篇文字就是我对这种想法的尝试和实践。

但是写记录生活事实的回忆文字，毕竟和写小说不一样。小说家虽应该遵从生活真实，但他们都拥有一种艺术创造的权利，情节由他编来，人物由他塑造，在文艺学的教科书里，这叫作“虚构”。而回忆录的作者则是不仅不能胡说，而且不允许有任何的虚构。既是记录过去生活的事实，你就必须严格遵从事实的真实，你所写的必须是已经发生在过去生活中的实事，决不可欺世欺人，胡编乱造。这就给想要写“小说体回忆”的人提出了更高的写作规范和要求。

不过这并不是不能办到的事。在我学习写作的过程中，有一位世界文学大师的一部名作，给了我这种写作方法的指导和启发。我说的是我们大家都熟知的，俄国十九世纪伟大作家屠格涅夫，和他的那本名作《猎人笔记》。

记得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创作《猎人笔记》时，屠格涅夫就好像是漫步在俄罗斯那片辽阔大地上，这本书里的一个个故事就是他从那片沃野中随手采来的一朵朵鲜花，一朵朵能够充分显现和代表他的祖国俄罗斯大地真实面貌和生活实质的鲜花。屠格涅夫笔下所描述的那些事件和人物，都是他直接从生活中发现，并且几乎是不加任何修饰和虚构而如实记录和描绘出来的，而这些事件和人物又都毫无疑问具有高度的概括性、代表性和文学形象的典型性。也就是说，屠格涅夫这位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在这部作品中描述的，都是具有高度艺术价值的“典型环境”和“典型性格”。

屠格涅夫这样做到了，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也来学学他呢？哪怕是“取法乎上，仅得其中”也好。于是，我想到要从我过去的经历、体验和接触中，就记忆之所能及，选取一些令我终生难忘

的人和事,把他们用写小说的方法,而又不加虚构地如实记录,提供给比我年轻的读者朋友们,帮助他们认识和了解我们国家过去一段时间里的生活真实。我这样想着、想着,一个个人物和一段段故事便蜂拥而至地出现在我的脑海里。二吉子,桃花姑娘,青竹妹妹,赵师傅,冯哥和他那一伙兄弟,梅丽……以及和他们相关联的一件件事情,便都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化为文字出现在我的电脑里。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记忆力是随着时间和人的年龄而减退的,在我凭着记忆把这些人和事写成文字的过程中,我当然发现,有些微小的情节或生活细节早已被光阴和年龄冲刷得不知去向了。这时,为求维护故事的形象性和完整性,我只能联系上下文,根据事件本身的逻辑来给予必要的补充。这或许也不能算是虚构吧。而且,在总体上,主要之点上,在事件和人物所要表现和说明的根本思想和事实真实上,这些细枝末节都无碍宏旨。

现在,“木已成舟”了,文章已经呈现在读者的面前。我所做出的这些努力和尝试效果究竟如何,就要请诸位朋友们给予批评和指教了。

这些就是我想在书的开头告诉读者的话。我还想要说的几句话是,我要对高彦杰和陈蕾两位同志致以真诚的感谢,没有她们亲切而又细致入微的帮助,这本书是印不出来的。

智 量

2010年9月,在上海第六人民医院病房里

目 录

一本书,几个人,几十年间	
——我与《叶甫盖尼·奥涅金》	1
这样,我来到上海	35
外语给我惹来的麻烦	61
“现行反革命”	71
老章和我所欠的房租	91
黄浦江边	101
赵师傅	133
六十年前考大学	147
迎春的花儿	157
永远的忏悔	171

我永远记得它	183
王良大伯	201
我的朋友二吉子	213
青竹妹妹	237
桃花姑娘	259
一片残叶和一片落叶	301
怀念施蛰存先生	319
怀念翻译家余振先生	325
怀念前辈诗人辛笛	333
怀念王璞同志	341

一本书，几个人，几十年间

——我与《叶甫盖尼·奥涅金》

我所写下的这些回忆，不仅是记录了一本翻译书的诞生和成长过程，似乎也同时，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和某些侧面上，记录了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国家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活的发展和变化。抚今追昔，真是感慨万分！

从我学习俄语说起

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我开始翻译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后来,我自己和我的这项心爱的作品,在我国政治气候的冷冷暖暖中沉浮,经过了二十多年的风雨,到1982年,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后屡次重印,并收入各种不同的文集和选集中。现在,一个新的世纪开始了,这个译本经过修订,又再版出书,并很快重印。看来读者是喜欢我的译本的。我为它写的一篇《译本修订校改后记》也受到读者的青睐,已经在一些文集和报刊上几次转载。主要由于我几十年来在《叶甫盖尼·奥涅金》这本书的翻译上所做的工作,以及我所做的其他翻译工作,我被授予“资深翻译家”的称号。作为一个外国文学工作者,能为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做出一件有点价值的工作,我当然感到欣慰。

普希金是俄国文学之父,他的这部诗体小说是十九世纪俄国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作品,也是世界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作品之一,是全人类的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读者喜爱它是理所当然的,我的翻译只是起了一个并不完美的桥梁作用。我在这里不想多谈这部作品本身的价值,或者我的、其他同志们的译本的短长,而是想要

向读者朋友们汇报一下这五十多年来,与我翻译这本书有关的一些细节。虽然其中许多都只是些个人的体验或感受,但是我觉得,您能从中察觉到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的时代和我们的国家的某些侧影。这篇文字可以说是我那篇《后记》的扩大和增补,那里只是谈到这本书的翻译出版过程,很少涉及其他。而有些我所经历过的事情,对于关心我们国家的人,尤其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和那段历史的年轻一代的朋友,知道一点也许是有益处的。

抗日战争时期的1941年,我在陕西城固县西北师范学院附中(北京师范大学附中迁移到后方时使用的名称)读书时,一本三十年代上海出版的,韦丛芜先生翻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深深吸引了我,使我很小年纪就爱上了俄国文学。那时我就很想学会俄语,想在将来成为一个俄国文学研究者。后来,到四十年代末,我读到了戈宝权先生主持出版的《普希金文集》,更增加了学习俄国文学的渴望。现在大学里俄语系的学生很难想象,我们那一代人想学俄文和俄国文学是多么地艰难。1948年,在当时蒋介石反动政府统治下,我和几个有同样爱好的同学,在北京西城区宣武门内国会街北京大学四院里,悄悄地自学俄语,不敢让别人知道,因为俄语是和俄国(当时是苏联)、共产党当然地联系在一起的,偷偷学俄语的人被认为就是共产党,抓着就要坐牢的。

1949年2月,北京刚一解放,一切都还没有安定下来的时候,由于十分缺少俄语人才,当时还没公开的地下党组织立刻组织一批北大学生,到老解放区哈尔滨的俄语干部学校去学习。那个学校当时名叫“哈尔滨外国语学校”,是从延安搬过去的。我们几十个人挤在一节没有窗子的铁皮闷罐车里,躺在一堆稻草上,两天两夜到达哈尔滨。记得路过沈阳的时候,看见车站上用俄文字母拼写的站名,一种“改朝换代”的感觉让我们非常兴奋,也让我们感到

迷茫。同行的同学中,大多数像我一样,对于共产党和中国的未来都缺少深刻的认识和具体的想法,不过,作为年轻学生,大家投身新时代的要求都是很强烈的,我们都为自己能够在解放后第一批去老区学习俄语而骄傲。刚到哈尔滨的第二天,我们几个人,身穿解放前大学生都习惯穿着的长棉袍子,走在哈尔滨道里商业区的大街上,那里的店员竟指点着我们相互说,这些人一定是从关内抓来改造的。后来我们就不敢再穿长袍了,出门都穿学校发给的一寸多厚的军用草绿色棉大衣。从生活自由散漫的北京大学学生,忽然变成吃供给制饭穿解放军衣的“革命干部”,大家一时还很难习惯。

我在哈尔滨外国语学校读了六个月,掌握了俄语的一些基础知识,还有幸在秋林公司买到一套三大本的,1947年莫斯科出版的《别林斯基选集》和一本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的插图单行本。《别林斯基选集》是用粗糙的淡黄色木造新闻纸印的,封面是黑色的粗布,三本书一共三四千页,有好几斤重,字体也不是很美观。《奥涅金》单行本的插图也不很清晰。这说明当时“苏联老大哥”的印刷工业水平并不高。不过,能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出版古典作品,也说明他们是重视文化事业的。我当时的俄语水平很低,不能读这些书,但是我坚信自己以后一定能读,也一定要读,使用身边仅有的钱不顾一切地把它买下来。

到1949年7月,由于关节炎复发,我不得已重又回到北京,再读北大。幸运的是,当时为了适应整个国家迫切的政治需要,从1949年9月起,北大在西语系内开办了俄语组,我就转系过去(我原来读的是法律系),成为北大俄语组(后来成为俄语系)的第一届学生,也是系里的团支部书记。

解放初期的大学生都是由国家养着的,但生活相当艰苦。那

时我们吃的是玉米粉窝窝头和小米粉加黄豆粉做的丝糕,十天半个月难得有一点肉味;穿的大多是家长的旧衣,冬天大家都是一件长棉袍子。但是在新中国成立的热烈气氛中,我们班的每个同学都充满热情、活力和理想。艰苦的生活大家都不在乎,一心只要努力地学习,恨不能把俄语在最短时间里学到手,马上就可以去参加工作。那时我和同班同学无论春夏秋冬,每天清晨都在沙滩北大红楼和灰楼之间的民主广场上高声地朗读俄语,好像自己多背一页书,祖国的建设事业就多一份力量似的。应该说,当时大学生的思想比现在的大学生要单纯得多。或者说简单得多。

开始学习和背诵《奥涅金》

我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开始阅读,后来又开始背诵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的。用的就是我从秋林公司买到的那个本子。起初是对照着吕荧先生的中译本和一个很不错的英译本一句句读,看不懂和觉得他们译错的地方,就去请教老师。我的几位俄文启蒙老师都是名家,是我国俄语和俄国文学界的老前辈,如刘泽荣先生、曹靖华先生和余振(李毓珍)先生。那时我们不仅没有收音机、录音机、复读机等等,就连俄汉字典也没有。实在不懂了,就去查一本日本人八杉真利编的《露和词典》(即俄日词典),通过日本的通用汉字去猜测词义。就这样,我居然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完全用课外时间和自学方式,把普希金这本诗体小说中的四百多个十四行诗节全都背了下来。这使我的俄语学习得到很大的进步。到1950年冬天,我已经开始为报刊和出版机构翻译一些俄文材料,挣钱改善生活;但是对于心中几乎奉为神圣的《叶甫盖尼·

奥涅金》,我虽然一再在反复背诵中品味,却一直不敢想到自己来翻译它。

1951年,全国开展三反、五反运动,我是北大校本部“打老虎”队的一个小队长,带领一批学生调查当时的总务科,让那位姓袁的科长吃了不少苦头。而即使这时,我还是没有放下我的《奥涅金》,一有空就默读它。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这样做是不合时宜的,我为此被批评过,说我没有全心全意为革命。但是我自己觉得我一点也没有影响工作,仍旧“我行我素”。

1952年,读到三年级时,我提前毕业,成为北大的俄语教师。这时俄语组已经成为俄语系,由于教师紧缺,聘请了许多原来住在北京城里的有一定文化水平的“白俄”(十月革命后逃到中国来的俄国人以及他们的子女,这时苏联政府已接受他们为苏联公民),让他们担任教学工作。我曾经拿一些《奥涅金》中我还没完全弄清楚的诗句去请教他们,我发现,这些人都熟悉这本书。这说明普希金在俄国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和《奥涅金》对俄国文化的巨大影响。不过一涉及书中包含较深哲理的地方,或是有关俄国和世界文化历史背景的地方,这些人就讲不清了。

1953年,我国请来了大批苏联专家,北大也来了许多。他们当时在学校和系里的权力很大,样样事都要听他们的指示。不过他们对我很有好处。我从俄语系调到中文系给文艺理论专家皮达可夫做课堂口译,这位先生和俄语系的卡普斯金教授夫妇对我进一步理解《奥涅金》有很多帮助。他们当时对我这个中国年轻人如此熟悉这本书感到惊讶,他们向我讲述普希金在俄国和世界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讲《奥涅金》这本书的价值和意义,鼓励我钻研下去。虽然他们的指导中带有很大成分的俄罗斯民族的主观意识,态度上也多少有一点居高临下,但毕竟使我得到许多新的知识和

启发,至少,作为俄罗斯人,他们比我更知道普希金和俄国文学。他们的帮助使得我更加喜爱《叶甫盖尼·奥涅金》,也增强了我继续研读普希金的动力。

大约是在1953年,我国文艺界从上而下地掀起了一场批判所谓“反革命分子”胡风和他的“小集团”的运动。这可把我吓了一跳,因为恰在这时我把吕荧翻译的《奥涅金》成天拿着,他和“胡风集团”是有牵连的,他的那个译本中,还有一节诗是胡风从日文翻译过来的,他把胡风的译文用在了自己的译本里,是为了对胡风表示敬意。他并且在后记中这样告诉读者。而我也欣赏胡风的这节翻译,还一再拿它给别人看。另外,我在1950到1952年间,曾是北大学生文艺团体“新文艺社”的负责人,我请胡风到社里和学生座谈过;胡风最要好的朋友路翎恰好是我的好友的哥哥,我曾因为这个关系几次到路翎那里去,听他谈些有关文艺创作的事;再加上我那时使用着“泥土”这个笔名,而胡风他们的出版社就叫“泥土社”,我还把我从俄文翻译的一部土耳其作家希克梅特的诗集邮寄到那里打算出书。这些事凑在一起,在当时那种气氛下,我真怕自己受到牵连。幸好没有发生这样的事。大概因为有些事人家并不知道。而在那个时候,“宁左毋右”的做法是很普遍的。我被牵连是完全有可能的。

1954年,我调入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最初在理论组,奉命精读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理论家别林斯基的原作。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理论家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三人的著作在当时是被我国文艺理论界奉为经典的。这时我使用的就是我1949年在哈尔滨买到的那套《别林斯基选集》。我细读了他的那一组论普希金的名文,尤其是两篇专论《叶甫盖尼·奥涅金》的文章,让我对普希金和这本经典名著的理解和鉴赏力提高一步。后来我转到